

中国共产党史人物研究会 / 编

中共党史人物傳

精选本
16

【统战与国际友人卷（下）】

陈嘉庚 谭平山

罗明那兹

周叔弢 马林

罗易

胡厥文 加伦

柯棣华

高崇民 汉斯·希伯

埃德加·斯诺

章乃器 白求恩

维经斯基

章士钊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鲍罗廷

黄炎培 罗生特

程潜

楚图南

廖仲恺

凍原為重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 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精选本
16

陈嘉庚

【统战与国际友人卷（下）】

陈嘉庚 谭平山 埃德加·斯诺

周叔弢 马林 维经斯基

胡厥文 加伦 鲍罗廷

高崇民 汉斯·希伯

章乃器 白求恩

章士钊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黄炎培 罗生特

程潜 罗明纳兹

楚图南 罗易

廖仲恺 柯棣华

中共党史出版社

目 录

陈嘉庚 / 001

周叔弢 / 015

 宦宦家庭 / 016

 兴办实业 / 016

 迎接解放 / 018

 花甲从政 / 020

 无私奉献 / 025

 耿耿丹心 / 028

胡厥文 / 030

高崇民 / 049

 从爱国斗争开始光辉的一生 / 050

 为救国奔走百折不回 / 051

 在西安事变中立下功劳 / 053

 赴延安献身革命事业 / 056

 高举东北救亡旗帜 / 057

 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 / 059

 努力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 060

 为社会主义事业殚精竭力 / 063

 铮铮铁骨，耿耿丹心 / 065

章乃器 / 069

章士钊 / 092

- 游侠少年 / 093
- 风流欧亚 / 098
- 老虎总长 / 104
- 律师生涯 / 107
- 重庆时代 / 110
- 金石之交 / 113
- 文革风云 / 117
- 星殒香江 / 122

黄炎培 / 125

- “兴亡梦觉惊风采” / 126
- “家国愁肠日九回” / 128
- “忧国心肠三合作” / 132
- “为真民主而拼命” / 135
- “谁仁谁暴终需问” / 138
- “别开蹊径为平民” / 141
- “一分精神全为国” / 145
- “双鬓斑斑知未晚” / 148

程 潜 / 153

- 投笔从戎 / 154
- 讨袁名将 / 158
- 护法前驱 / 162
- 中山良辅 / 164
- 北伐功臣 / 167
- 反蒋波澜 / 169
- 力主抗日 / 171
- 义声昭著 / 175
- 老而弥坚 / 185

楚图南 / 191

投身革命 / 192

派往东北、山东、上海开展革命活动 / 195

昆明地区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 200

西南地区文教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 / 204

新中国民间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开拓者 / 207

廖仲恺 / 213

积极参加反清革命 / 214

在讨袁、护法斗争中建立功勋 / 216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 / 219

创建黄埔军校和黄埔军 / 225

大力扶助工农运动 / 230

镇压商团叛乱 / 233

国共联合战线的主脑 / 235

推行财政统一 / 236

支持省港大罢工 / 238

为维护国共合作而牺牲 / 239

谭平山 / 242**国际友人卷****马 林** / 272**加 伦** / 284**汉斯·希伯** / 293**白求恩** / 307**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 334

罗生特 / 353

-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 / 354
-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355
-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 357
- “新四军里的白求恩大夫” / 359
- 为罗荣桓治病 / 361
- “妇女的救星” / 363
- 大力培养医疗人才 / 364
- “我爱中国人民” / 366
- 不能听不到枪炮声 / 368

罗明纳兹 / 372

罗 易 / 388

柯棣华 / 403

埃德加·斯诺 / 419

维经斯基 / 445

鲍罗廷 / 470

陈嘉庚

杨国桢

◎ 编撰者话

陈嘉庚，我国杰出的华侨领袖，曾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并以报效祖国的赤诚，倾资兴学。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参加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斗争。后来又领导海外华侨声援祖国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回国，担任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工作。他是华侨的榜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父亲陈杞柏，侨居新加坡经营米店。陈嘉庚由母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童年便参加农业和渔业劳动，九岁入本社南轩私塾就学。

1890年秋，17岁的陈嘉庚首次出洋，到新加坡其父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新加坡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华侨备受外国殖民者的欺侮摧残的社会环境，激发了青年陈嘉庚渴望祖国强盛和报效祖国的热情。1893年，他归国娶亲，次年便倾其积蓄2000元，在集美创办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1904年，“顺安”米店因连年亏损而倒闭，负债二十余万元。陈嘉庚决心代父还债，乃集资2000元，建起一所菠萝罐头厂，开始独立经营。他善于捕捉市场信息，改善企业管理，不久便在新加坡菠萝罐头业中站稳了脚跟，并进而增设米店、熟米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他终于在其父去世的前一年——1907年，代父还清了债务。以后，他逐年扩大企业规模，至1911年，就成了一个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米厂、一间米店，存款约五十万元的华侨实业家。

1906年2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亲自在新加坡晚清园建立了同盟会分会，成为南洋各地革命党人活动的总机关。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影响，为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所感动。1909年，陈嘉庚由友人、同盟会会员林义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山和同盟会会员的一次秘密聚会。1910年春天，陈嘉庚加入同盟会，剪掉发辫，表示与清政府决绝。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11月11日，福州光复。新加坡的福建侨胞激动万分，决定组织福建保安会，负责筹款救济闽省，维持治安，陈嘉庚被公推为会长。他发电同福建同盟会会长黄乃裳联系后，立即汇回银圆二万元，此后又陆续筹款十余万元，给新政府以有力的财政支持。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从欧洲回国，于12月16日途经新加坡。陈嘉庚热情地接待了孙中山，并欣然答应给予财力支持。不久，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嘉庚汇款五万元表示支持。从加入同盟会到大力支援辛亥革命，体现了陈嘉庚爱国的政治热情。他走出经商发家的小圈子，投身于

民主革命洪流，为国外侨胞和爱国民主人士做出了榜样。

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陈嘉庚兴高采烈，“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1]。他认为自己是一平凡侨商，除多少有些资财外，愧无其它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2]，决心兴办学校，为祖国培育人才。后来，他在一封信中追述说：“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迨光复后猛省勃发，刻刻不去于怀。窃念份子天职，欲实行报效工作，尤以乡梓需要为急务，故不计成败，痛下决心，实事求是，以文化为基础，势忧勇往，有进尺无退寸，抱定破釜沉舟之志也。盖深信国体改革，纷敌政争，乃必经之程序，至多二三十年，自有光明安泰之来临。若不乘时即下种子，以备十多年后之收获，未免临渴掘井。”^[3]1912年9月，陈嘉庚回国。次年1月，创办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此后几年，他一面自己在新加坡继续经营企业，一面委托弟弟陈敬贤夫妇在家乡办学，先后办起集美女子小学校（1917年2月）、集美师范和中学两部（1918年3月）、幼稚园（1919年2月）。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陈嘉庚由于战时加营航运业，企业发展顺利，已经成了拥有四百万元资产的大实业家。他的经营重点从菠萝罐头业转移到橡胶业上。但是那时的中国，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之下。陈嘉庚目击时艰，痛切地感受到：“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4]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于1919年6月回国筹办厦门大学。7月12日，他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召开的筹办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上，当场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三百万元；并慷慨陈词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勿自馁其志，而视为杯水车薪，无裨大

[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4页。

[2] 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1918年6月）。

[3] 载1937年4月30日《南洋商报》。

[4]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通告》，载《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1920年。

局，乃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深望海内外同胞也！”^[1]陈嘉庚亲自选择校址，规划建设，物色校长，延聘人才，使厦门大学得以在1921年4月6日正式开学。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管理集美学校校务，并增办了水产科（1920年2月）和商科（1920年8月）。1921年2月，定总校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1923年，经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

陈嘉庚抱着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特别注重师资队伍和学生素质的培养，不惜重金广揽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任教，吸收出身贫寒的有志青年入学，给予种种减费免费优待。他赞赏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主张学校应对各种新思潮兼容并蓄，允许学生独立思考，关心国事。这些开明的做法，使初创时期的集美学校（特别是师范部）和厦门大学，成为五四运动以后福建的民主堡垒和革命摇篮。1926年，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的九名福建学员中，就有八名是集美学校的学生。中共福建省委早期的领导人罗明、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郭滴人等，都是通过集美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厦门大学在1927年以前就被誉为“南方之强”，鲁迅等著名学者在这里任过教。1927年春，该校便有了福建省最早的共产党支部。

三

1922年3月，陈嘉庚再度出洋，继续在新加坡经营橡胶业，集资扩充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兴办华侨文化教育事业。1925年，他所经营的橡胶园扩大到一万余英亩，并有工厂30余所，分店150间，代理处遍布五大洲40个国家及48个地区，雇用职工常达三万余人，规模之大为南洋第一，实有资产达新加坡币1200万元，“为一生登峰造极，得到最多和资产最巨之时”。此时，他不仅扩充厦大、集美两校规模，还资助了福建省28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校。

可是，从1926年起，由于胶价猛跌和日本胶制品在东南亚削价倾销的影响，陈嘉庚的企业连年亏损，加上支付办学经费和银行利息，每年超支一百数十万元。1928年，他的一所胶晶制造厂为亲日奸商雇人纵火焚毁，损失近百万元。三年之中，陈嘉庚的资产损失殆半，仅存实额五六百万元。至1929年又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打击，陈嘉庚的企业是每况愈下。当时有

[1] 《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

人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集中财力度过不景气之年。他坚决不肯，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1932年，某外国垄断集团提出以停业维持集美、厦大两校为条件，把陈嘉庚的企业作为附属公司加以“照顾”。他断然拒绝说：“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1931年8月，陈嘉庚被迫接受银行条件，将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陈嘉庚在经济危机和外国垄断资本压迫的夹击下破产，所有营业全部收盘。此后，他仍百折不挠，为筹集厦大、集美两校经费多方奔走。无奈经济拮据，不得不于1937年将厦门大学无条件移交国民党政府，改为国立大学。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济南惨案之后，陈嘉庚联合新加坡华侨，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亲任会长，积极发动华侨捐款一百三十余万元，救济被害的山东民众，并在侨居国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他在新加坡召集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并联络华侨开展救亡活动。1932年1月，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热忱支援；并号召侨胞：“时至今日，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各尽所能，以与暴日抗！”^[1]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陈嘉庚走在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同年8月，他出任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1938年10月，出任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主席；他团结广大华侨，踊跃捐输，先后募捐国币两亿多元，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

“南侨总会”成立之际，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抗战进入危急阶段。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10月22日，陈嘉庚从路透社电讯中获悉，立即发电规劝汪精卫。当汪精卫复电狡辩时，他又于25、26日连发三电，痛斥汪精卫是秦桧、张昭，并将来往五电公诸于世。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从新加坡向大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电报提案，给当时喧嚣一时的主和论以沉重的打击，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2]。

汪精卫受到陈嘉庚提案的抨击，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于1938年12月18

[1] 陈嘉庚：《致叶涵函》（1932年3月6日），载《集美周刊》第11卷第5期。

[2] 邹韬奋：《抗战以来》。

日潜逃越南，29日在香港发表“艳电”，公开赞成日本首相近卫亡华的和平三原则。陈嘉庚闻讯，当即致电蒋介石，指出：“汪精卫甘冒大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1]。当国民党庇护汪精卫，“仅革党籍，未及国法”，以搪塞国内外舆论时，陈嘉庚又于1939年4月13日，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及国民参政会，进行质问和追究。

汪精卫是陈嘉庚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时期结识的老友，厦门大学筹办时曾聘他为校长，两人的私谊一向很厚。在民族危难的紧急时刻，陈嘉庚不顾私谊，毅然站出来揭露、声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罪恶活动，并且追究到底。

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使南洋八百万华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统一组织。他们不但慷慨捐输，“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2]。而且有成千上万的华侨志士回国服务。

四

1939年冬，陈嘉庚为使广大海外华侨确切了解祖国抗战局势，增加爱国热心，慰劳忠勇抗敌的将士和灾难深重的同胞，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以下简称慰劳团），计划于来年3月回国进行三个月的慰劳视察活动。通告登报后，各地爱国华侨热烈响应，踊跃报名，但却遭到中驻新加坡领事馆总领事高凌百为首的国民党人的刁难和捣乱，甚至有人化名致电重庆，诬告慰劳团大半是共产党员，妄图阻止慰劳团成行。1940年2月，慰劳团组团前夕，高凌百一反常态，提出作为陈嘉庚代表的身份随团回国。陈嘉庚本来没有打算亲自回国。他发现高凌百企图插手，“必非好意，或别有使命”，乃匆促作出决定，电邀“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和李清泉（李因去美国未能成行）一同回国视察。

3月6日，慰劳团大部分代表汇集新加坡组团出发。15日，陈嘉庚从新加坡到仰光和庄西言会合，于26日乘“康定”号飞机直飞重庆。在重庆江底机场，他即席答记者问，激动地说：“我离开祖国已十八年了，对于国内的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

[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72页。

[2]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13号。

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1]

在重庆等候慰劳团其他成员到来的日子里，陈嘉庚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各界人士，报界记者，福建同乡和厦大、集美校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参观了街市、工厂。在重庆的中共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三件。中国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欢迎茶会，陈嘉庚在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陪同下前往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南洋华侨声援祖国抗战的情形，呼吁国共加强合作，一致对外。叶剑英上台致谢说：他欢迎的不是资本家的陈嘉庚，而是欢迎革命的陈嘉庚^[2]。会后，陈嘉庚向叶剑英表露了访问延安的愿望，还详细询问了赴延安沿途交通食宿的情况。几天后，毛泽东来电，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4月14日，慰劳团全体成员到达重庆。经过十几天紧张的参观访问之后，分成三个团，于5月1日分赴各地进行慰劳活动。庄西言因荷印局势紧张，提前南返。陈嘉庚为了准备访问延安，没有与慰劳团同行。

5月5日，陈嘉庚由重庆飞抵成都，蒋介石在军校内设公宴隆重接待陈嘉庚，询问了陈嘉庚的活动安排。当他知道陈嘉庚决意往延安一行时，便大肆诋毁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等等，劝陈嘉庚“勿受欺骗”。5月14日，陈嘉庚飞抵兰州，并到青海西宁视察。在兰州，他和第三慰劳团会合时说：“我们华侨是无党无派的，……，不是以任何那一党的立场去慰劳。……我觉得我这次回国，无论国民党、共产党，各方面的领袖都要见一见，听听他们对我说什么话。他们对抗战，对团结，说了真心实意的话，我要听；即使是假话，我也要听听。因为将来有一天，如果有谁不实践他们说过的话，……不守信义，那末，我就有好说的了。我可以对侨胞说：‘他亲口对我说的，他对我说的话都是假的’。”^[3]5月25日，陈嘉庚抵西安，和第一慰劳团会合。当他听到第一慰劳团曾应朱德将军的约请，去七贤庄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和途经西安前往重庆的周恩来会晤，竟被陕西当局阻挠而失约的消息时，亲自到七贤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请他们代电延安向朱德将军道歉。

[1] 《渝机场万头攒动，欢迎陈嘉庚先生》，1940年4月3日上海《国民日报》。

[2] 仲约：《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1940年11月22日缅甸《仰光日报》晨刊。

[3] 仲约：《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

5月30日，陈嘉庚从西安出发，于31日下午5时半到达延安，受到吴玉章、萧劲光、高自立和三千余名群众的迎接，并出席了延安各界欢迎大会。

6月1日上午，陈嘉庚参观女子大学，和朱德亲切会见。下午4时，毛泽东在杨家岭住所窑洞里会见了陈嘉庚，进行第一次长谈。他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见给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一是共产党领袖所住的窑洞如此的简朴，是意想不到的。二是毛泽东衣着朴素，神态慈祥，和下属关系融洽，实行“平等无阶级制度”，是前所未见的^[1]。

接连几天，陈嘉庚在延安参观，接触了各方面的负责人。6月5日晚，朱德主持演讲会，由陈嘉庚报告南洋华侨支援抗战的情形。6日，陈嘉庚在朱德和夫人康克清陪同下，访问了安塞县。7日晚，出席延安各界人士的欢送会。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到交际处和陈嘉庚共餐，纵谈抗战局势和国共团结抗日问题。毛泽东托陈嘉庚代向蒋介石表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希望陈嘉庚将在延安的见闻如实向侨胞报告。他表示这两件事一定负责做到。

陈嘉庚在延安停留的九天中，所获得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在思想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十分剧烈的，他把在重庆和延安的所见所闻作了比较之后，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他后来在成都对慰劳团团员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2]后来，又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上写道：“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在《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中，他还写道：“过去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

[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55页。

[2] 庄明理：《纪念陈嘉庚先生》。

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1950年7月3日，他在写给董必武的一封信中，又回忆说：“自到重庆后，其政治腐化，在洋久已了解，唯抗日战争发生后国共合作，深喜有最后胜利可期，不意见重庆政府等人轻视日寇重视延安，蒋竟明白告我必先消灭共党，抗战乃能胜利，似有对贵党剑拔弩张之势，我忧虑莫可言喻。……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对待，故决心速往访延安。……自是一心仰服，矢志不移。”^{〔1〕}延安之行，使陈嘉庚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模糊认识，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

五

1940年6月8日，陈嘉庚惜别延安，前往山西、河南战区继续视察，26日飞抵成都。在峨嵋山避暑半余月后，7月17日，飞抵重庆。在重庆，陈嘉庚结识了周恩来，又和叶剑英两次会面，交谈英国宣布滇缅公路禁运后的局势。

7月24日晚，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的邀请，到留法、比、瑞同学会演讲《西北之观感》。他首先表明是他了解到主持人“诚意欲知西北事实，而非要余造作宣传共产党罪恶，故接受之”才来的。在演讲中，他如实地介绍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矫正了大后方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解放区的错误视听。听众耳目为之一新，反响强烈，掌声雷动。因此，国民党当局对陈嘉庚极为不满。他们污蔑陈嘉庚“以华侨领袖地位，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并压制报纸报道。28日，蒋介石召见陈嘉庚。当陈嘉庚转述阎锡山所说：“国民党政治须行得好，共产党自消失无疑”等语时，蒋介石面红气盛，大骂共产党，叫喊：“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陈嘉庚见他如许冒火，不欲多言，在说过“华侨心理，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等话后，便告辞而出。第二天，蒋介石为笼络华侨，又在黄山别墅为陈嘉庚饯行。宴会后复频频追问陈嘉庚对国民党的观感如何。陈嘉庚对蒋介石的盛情接待颇为感激，但又不愿顾私谊而损大公，再三推托，最后不得不献言一二，如实列举南洋国民党人的种种劣迹。

7月30日，陈嘉庚离重庆飞昆明，打算参观西南各省和回福建探亲后出

〔1〕 信函底稿原件藏集美学校校委会。

国。蒋介石见陈嘉庚不肯改变态度，遂指示各地当局监视陈嘉庚的活动。他自知进献忠言，引起蒋介石的不快，但仍不改初衷。到昆明后，又亲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钧座对余盛气痛骂共产党事，亦必有人报告余在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各情。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凭余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也。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余所要求者，完全为国家民族计，与共产党毫无关系。……万乞注意勿为人所误，至荷至幸！”^[1]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等省参观时，他抱定“必以是非为好恶，不以刚柔为爱憎”的立身之道，对延安见闻，“他不问，我定不言，若有问，决不能指鹿为马也”；对贪官污吏，则严加抨击。回到福建后，他屡次电告蒋介石，猛烈抨击闽省苛政，为民请命。他明知蒋介石对他“已生恶感，无法挽回”，但仍在离闽返回新加坡途中，据理抗争。

国民党当局害怕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电示新加坡总领事馆，以陈嘉庚“与共党亲善”、“有共产党色彩”为由，要求英国政府禁止陈嘉庚入境。阴谋未逞，又派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到南洋各地活动，破坏陈嘉庚在华侨中的威信。

陈嘉庚于1940年12月31日回到新加坡。新加坡筹赈会决定于1941年1月5日在快乐世界运动场召开万人欢迎大会。先期抵达的吴铁城，即以“陈嘉庚将宣传共产，对中英均不利”为由，唆使英籍随员出面要求新加坡政府下令禁止，但又未能得逞。吴铁城气急败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攻击陈嘉庚“口是心非”，“拥护蒋委员长是假的”等等。吴铁成还借“皖南事变”，指使国民党人操纵的马六甲筹赈会，吁请“南侨总会”谴责新四军“叛变”，通电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中央政府命令”。陈嘉庚援引提案须有十个筹赈会会员同意方得成立的规定，严加拒绝。吴铁城仍不死心，千方百计地在“南侨总会”内部推行倒陈运动，破坏南洋华侨的大团结。陈嘉庚不愿侨胞在抗战时期自相倾轧，愤然在报上登出启事，要求辞去“南侨总会”主席职务，消息传开，海内外舆论为之大哗，纷纷函电挽留。

3月29日至31日，第二届南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陈嘉庚在会上怒斥吴铁城贪黷误国、高凌百拥汪亲德等罪行，揭露国民党分裂华侨的鬼蜮行径。大会代表经过讨论，不同意陈嘉庚辞职。投票结果，陈嘉庚以151票赞成，1

[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1、192页。

票反对，连任第二届“南侨总会”主席。4月1日至3日，南洋闽侨代表在大世界舞厅集会，正式成立“南洋闽侨总会”，选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中伤，反而使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的声望更高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派遣飞机轰炸新加坡。英国当局惊慌失措，准备放弃新加坡。在这危难关头，陈嘉庚慨然集合华侨，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亲任会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来，该会领导下的华侨抗日武装，独立抗击日寇的进犯，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1942年1月底，英军慌乱撤退，新加坡弃守。陈嘉庚估计自己回归祖国，“国民党要人决不容余立足”，不得不决定逃往印尼避难。2月3日，他乘船抵达苏门答腊，下旬转赴爪哇，开始了三年流亡隐居生活。

陈嘉庚在侨居爪哇的厦大、集美校友的帮助下，历尽艰难，躲过了日寇的严密搜捕。1943年3月，他开始秘密写作以华侨努力抗战为主题的《南侨回忆录》。他在潜踪匿迹、安危未卜的险恶环境中，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关心忧虑的是抗战形势，祖国存亡。他还作好了以身殉国的打算，曾慨然地对掩护他的校友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作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1]还作了一首古体诗以见志：“领导南侨捐抗敌，会场鼓励必骂贼。报章频传海内外，敌人恨我最努力。和平傀儡甫萌芽，首予劝诫勿迷惑。卖国求荣甘遗臭，电提参政攻叛逆。强敌南侵星马陷，一家四散畏虏逼。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敌。回检平生公与私，尚无罪迹污清白。冥冥凶吉如有定，付之天命惧奚益！”^[2]

1945年9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五条件投降。10月6日，陈嘉庚结束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返抵新加坡。消息传开，海内外爱国的中华儿女，无不为他安全脱险额手称庆。11月8日，重庆各界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脱险庆祝大会。毛泽东赠送的条幅上写着：“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的祝辞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讻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1] 黄丹季：《陈嘉庚先生玛琅避难记》，《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43页。

[2]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357页。